

论秦刻石

杨希珍 刘一峻

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朝后，从公元前二二〇年至前二一〇年，先后五次出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陇西边陲，东海之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出巡途中，秦始皇七次立碑，勒石纪功，使秦王朝的声威远播朝野。秦刻石经过二千多年的风风雨雨，阅尽世上沧桑，大部分已经湮灭。但保留至今的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的残碑，仍以其依稀可辨的小篆体刻文，向人们展示它昔日的风貌。《史记·秦始皇本纪》收录了“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的详细碑文，《金石萃编》收录了“绎山刻石”的全文。秦刻石不仅为我们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现存残碑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字发展史和书法艺术史也有着重要价值。但自汉代以来，围绕着对秦始皇功过的激烈争论，历史上对秦始皇出巡和刻石的评价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四人帮”假借批林批孔煽起的影射史学的妖风恶浪中，随着对秦始皇歌颂的不断升级，秦刻石的身价也扶摇直上。什么“法家路线的历史见证”、“新兴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的宣言书”、“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纪念碑”等等，一夜之间就把秦刻石变成了光耀千古的历史彗星。有的出版社印行了详加注释的秦刻石文的单行本，按照上面的调子牵强附会地解释了这些历史资料。本文不打算全面评论秦刻石。仅想就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的管窥之见，以就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和读者。

—

研究秦刻石，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要出巡？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人说是为了“镇慑奴隶主复辟势力”，这种说法既歪曲了秦代社会性质和阶级矛盾的真相，也缺乏令人信服的历史根据。

秦始皇率领大批臣子，在庞大的车骑卫队护卫下，五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刻石文，出处均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金石萃编》，下引，不再注），无疑是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活动。其首要和根本的目的，自然在于巩固秦王朝的封建统治。恰如胡亥所说，“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①那末，他究竟向谁“示强”，要谁“威服”呢？是“奴隶主复辟势力”吗？不是。这是因为，秦王朝建立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车轮已向滚动了一百五十多年。春秋时代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经过十数代的自然更新，此时大部分都随着封建生产方式取代奴隶制生产方式而转化成封建地主，就是秦王朝有意识地保存的奴隶制残余，也变成了封建剥削的补充形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都不存在全面复辟奴隶制的危险。秦朝的统一，使战国时期已占主导地位的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的矛盾在全国范围内

更加集中和深化，农民革命已提上历史的日程。因而秦始皇出巡，“宣省习俗”，是向黔首的主要部分农民“示强”和“镇慑”，以达到“黔首齐庄”的目的。南方的楚国，东方的齐鲁，是秦王朝最后征服的地区，也是秦末农民起义最早爆发的地区。伏莽在林，人心思乱。就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前二一〇年，这里就已经点燃起农民革命的星星之火。英布率骊山徒“亡之江中为群盗”^②，彭越在巨野泽中率渔民为“群盗”^③，刘邦私自放走刑徒，率部分壮士“隐于芒，砀山泽间”^④。对于来自东方的威胁，秦始皇自己也很清楚。“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⑤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五次出巡而四次都到东方的根本原因。自然，不应否认，出巡也有镇服六国旧贵族的作用。被秦国军队覆社天宗的六国旧贵族是分裂割据的种子。他们不甘失败，伺机复国，也构成对秦王朝的威胁。但与镇服农民相比，对付六国旧贵族毕竟是第二位的。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当年，就“徙天下豪杰于咸阳十二万户”，六国旧贵族绝大部分都被秦始皇搬到眼皮底下监视起来。漏网之輩如张耳、陈余等，为数寥寥蛰伏民间，已经无力单独掀起摇天撼地的风浪。如果秦始皇把他们看成主要威胁，那末，他只要坐镇首都，重兵严守，就可保无虞，根本不需要风尘仆仆，万里奔波。秦始皇出巡，还有视察前线，巩固边防的意图。前二二〇年，“巡陇西，北地，至鸡头山，过回中”^⑥。前二一五年，“巡北边，从上郡入”^⑦，经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云中、九原等八郡。返咸阳后，立即命令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修筑万里长城。这一切，对于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国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应当指出，巡游除了以上的政治军事目的的之外，还包含着“治驰道、兴以见主之得意”^⑧的游山玩水的目的，其中掺杂着觅仙山、寻仙人，找长生不死药之类的荒唐私欲。“皇帝春游，览省远方”。秦始皇四次出巡东方，多次到琅琊、之罘、碣石，几乎每次都带着徐市、卢生之类的江湖骗子，异想天开地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寻找什么蓬莱、方丈、瀛洲等神山，“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⑨。他还役使千人“欲出周鼎泗水”^⑩“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赍其山”^⑪如此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表现了封建帝王穷奢极欲的剥削阶级本性和昏头昏脑，可笑荒唐的无厌追求。

二

研究秦刻石，唯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秦刻石文大部分出自李斯之手。它丰瞻富丽，雍容典雅，是为秦始皇精心谱写的音调高亢的颂歌。其中有着秦始皇历史功业的真实纪录，也有不少过份美化的献媚谀词。实录和虚誉，真情和欺骗，磅礴的气势和呆滞的形式，捏合杂揉，构成了刻石文的全部内容和风格。

秦刻石文比较真实地记载了秦始皇在“嗣世称王”以后，“讨伐逆乱，威动四极”、“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建立空前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的历史功勋。歌颂了“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大一统局面。同时，也记载了秦始皇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制定了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大法《秦律》；“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巩固、扩大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和厉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实行了一

系列促进全国经济文化统一和发展的有力措施。所有这一切，改变了春秋战国以来“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真实地反映了秦王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打下的深刻印记。“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灾害绝息，永偃戎兵”，表现了秦始皇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那种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相信自己、坚信未来的生气勃勃的面貌。“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②上面这类刻石文表明，此时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正度着它的青春期，地主阶级正做着它的黄金梦，历史正肯定着它们存在的正当权力。

但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同，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的革命都把巩固地取得政权看作革命的结束。因此，与向奴隶主阶级夺权时期的法家大力宣扬朴素唯物论、朴素辩证法，朴素历史进化观以及“不分贵贱亲疏，一断于法”的朴素平等观不同，地主阶级在巩固地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立即把它昔日曾服膺过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则成为他们主导的思想武器，封建的君臣之礼，长幼等差，贵贱尊卑则成为他们理想的制度。他们把自己达到的成就看作历史的顶峰，力图把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的上层建筑、尤其是各项法律制度，变成永恒的典则、不变的法制、万古长存的模式，亿万斯年地保存和流传下去。秦始皇正是巩固地取得全国政权的地主阶级的第一个代表。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迈五帝”，是空前绝后的封建帝王；他建立的国家，古之所无，今之仅有，是空前绝后的永恒王国。刻石文充满了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礼赞：“治道运行，……皆有法式”、“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迹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也反映了地主阶级竭力把封建制度永恒化的企图：“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其中，半是真实，半是谎言；半是未来的理想，半是一厢的情感。但是，有一点至为明显的是，汉代董仲舒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详加论证的封建制度永恒性，在刻石的皇皇大文中已经透出了信息。然而，“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历史的辩证法必然以其铁律打破一切形而上学的昏话。就在秦始皇带着万世基业已由已定的心情溘然长逝的第二年，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陈胜、吴广奋起垓亩，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不仅顷刻之间把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化为灰烬，而且也第一次在历史上宣告了封建制度永恒论的破产。

三

恩格斯指出：“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③秦始皇刻石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远在刻石文中就有着明白无误的自供：“从臣思迹，本原事业”，“原念休烈，追诵本始”，“群臣嘉德，祇诵圣烈”。歌颂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进而把秦始皇时代制定的封建法律制度，作为永恒的典则，“以著经纪”，“表垂于常式”、“垂著仪矩”。所以，刻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地主阶级的印记，浸透着它强烈的阶级偏见。正因为如此，刻石作为一种历史资料，也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正象我们不能照着“正史”和“起居注”的样子去描绘封建帝王的面貌一样，我们也不能依据地主阶级自我歌颂的秦刻石去绘制秦始皇的圣相。而必须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仔细地从中剔除那些荒诞不经的呓语和连篇累牍的谎言，准确地把历史的真相再现给今天的人民。

请看秦刻石是以怎样的浓笔酣墨恣意塑造秦始皇“黔首救星”的英雄形象吧。他君临天下，功德盖世，是“临古绝尤”的大圣人。他“禽灭六王”、“周定四极”，完全是为了老百姓：“皇帝哀众”、“振救黔首”、“兴利致福”。统一中国后，他更加奋发有为，励精图治，一切为着黔首谋福利：“皇帝躬听，……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忧恤黔首，朝夕不懈”。他“勤劳本事，上农除末”，使“黔首是富”；他“应时动事”，“节事以时”，使“黔首安宁”、“诸产繁殖”；他“长隆教诲”，“不用兵革”，使“黎庶无徭，天下咸抚”；普天之下，莫不享受他播下的福风惠雨：“惠论功劳，赏及中马，恩肥土城”、“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按照刻石文的描绘，秦始皇统治下的中国，简直就是“万民康乐”、“百兽率午”的伊甸园。你看，在这里，是“普天之下，转心揖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久并来田，莫不安所”。人民都在一个统一的制度下生活，社会上呈现一片和平和安宁的景象，犹如一曲和谐的交响乐，在中国的大地上演奏着。“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一个“黔首康定、利泽长久”，没有兵革，没有纷事，各安其位、情谊融融的圣世已经降临人间：“大治濯俗，天下承风，……皆遵法度，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则同，嘉保泰平。”在这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见了，残酷的剥削和血腥的屠戮不见了。一个皇帝爱护万民、万民礼尊皇帝的阶级友爱合作的人间乐园跃然石上！这显然是对历史的横暴歪曲。“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在为秦始皇谱写那些音调铿锵的颂曲时，竟将这类地主阶级的自颂自赞作为真实的历史。“滑其泥而扬其波”，用旧的历史迷雾制造新的历史迷雾。

但是，历史的谎言从来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刻石之外的大量资料，以其无可置疑的真实性，揭示了秦始皇时期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历史真相。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大地，仅仅是地主阶级的天堂，对广大劳动人民说来不过是地狱。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了历史的巨大进步，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但是，毋庸置疑，封建制度同样是一种剥削制度，它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叱咤风云的秦始皇虽被刻石描写为“惠被诸产”的观音菩萨，但他的统一给广大刚刚挣脱奴隶制枷锁的劳动人民带来的并不是鲜花美酒，而是封建型号的新的索链。统一六国的胜利成功，冲昏了秦始皇的头脑。面对统一的大好河山和臣子们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的声音，他昏昏然，飘飘然。认为天下莫予毒，他可以所欲为、予取予求，恣意享乐了。他赋敛无度，戍徭无已，刑罚苛暴，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劳动人民推到死亡的边缘，从而也把秦帝国推向覆灭的绝境。

“今黔首自实田”、“上农除末”并没有达到“振救黔首”、“黔首是富”、“诸产繁殖”的目的。在秦王朝统治下，农民虽然获得了占有一小块土地的权力，但同时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兵徭和徭役。“上农除末”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长期坚持的一项政策，它丝毫不能表明封建统治者特别看重农民，仅仅说明他们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因为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农业是社会财富和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这一事实，是任何头脑正常的统治者都清楚的。认为“上农除末”就是“忧恤黔首”，就象把资产阶级的重工政策看作爱护工人一样荒谬绝伦。

“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生活的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

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⑭秦始皇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封建帝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政治活动。再加上为了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而大兴土木，造离宫、筑别馆，凿骊山、起阿房，这一切都需要丰厚的财力做后盾。既然秦始皇没有点铁成金的本领，秦帝国的财源就只能来自对农民的剥削。秦代赋税，既不象“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胡诌的那末“轻”，也不象秦刻石描写的那末“惠”。而是异常沉重，大大超过了农民的负荷能力。“始皇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⑮“秦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⑯“夏之贡，殷之助，周之籍，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丰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税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⑰正税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杂税苛捐：“秦之时，入刍稿，头会其赋，输于少府。”^⑱“提封之内，撮粟尺布，……尽专于己。”^⑲如此繁重的赋税，再加上法外的任意征敛，结果造成的是“男子力耕不足粮餍，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⑳那里有什么“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惠被诸产”、“黔首康定”的影子！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任务之一，是必须运用精审考订过的资料，去揭露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欺骗和谎言。与之相反，“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恰恰是把历史上统治阶级的谎言当宝贝，进而利用这些谎言对今天的人民进行新的欺骗，以把史学拉上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轨道。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繁重的徭役一直是劳动人民难以忍受的负担。在封建社会前期，徭役剥削就更加突出。秦代徭役之重，提供了比较典型的例子。秦用商鞅之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㉑“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㉒如此大规模地征发，就是依照“三十倍于古”计算，也难以足用。于是秦王朝又巧立名目，大搞所谓“谪法”：“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笈者。”^㉓“始皇三十四年，谪发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㉔“始皇三十七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㉕根据范文澜同志的推算，秦时被征发服役的人数，经常在三百万左右，约占全国二千万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除去老弱残疾和妇女，儿童，一般青壮年男子几乎全部都被征发了。刚刚从战国的战乱中挣扎过来的劳动人民，“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大难甫平，极需休息。但更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征发却使劳动人民陷于更加艰难的境遇。结果造成“男子不得修农田、妇女不得刻麻考缕”^㉖“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㉗和“死人以沟量”^㉘的惨状。对照这些铁铸一般的事实，刻石文中那些洋洋盈耳、沁人心扉的所谓“黎庶无徭”、“节事以时，诸产繁殖”等等，不都变成了“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㉙了吗！繁重的赋税榨干了农民的最后一滴血，沉重的徭役累断了农民的最后一根筋。社会简单再生产陷于中断，封建经济濒临破产。死亡逼使农民只得铤而走险，聚众反抗。陈涉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秦刻石虚构的人间乐园被农民革命的暴风骤雨彻底摧垮了。

“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㉚，它源于社会的财产关系。李悝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备的封建法典，它反映的是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封建的财产关系。挟着《法经》到秦国主持变法的商鞅，为秦国的地主阶级制定了一部较《法经》更为完备的封建法典。这部法典，后经秦始皇及其臣子们的损益而成《秦律》。它“轻罪重罚”，“繁密苛酷”，更加集中地反映了在全国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地主

阶级的意志。“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①，“步过六尺者有罪，弃灰于道者被刑”^②“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③。律令如此繁密苛酷，以致摇手触禁，人人自危，“黔首穷愁，饮泣永叹”^④，终日在惶恐中度日。刑制名目繁多，酷烈之甚，令人发指。肉刑有膞、劓、黥、宫、笞；死罪有弃市、腰斩、凿颠、抽胁、车裂、剖腹、囊扑、烹、绞、坑、戮尸等。甚至一人犯罪，就大量株连无辜，夷三族、灭家、灭里，再加上贪暴之吏，上下其手，刑戮妄加，草菅人命，结果造成了“赭衣塞路，圜圜成市”^⑤，“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⑥在这些阴森可怖，惨不忍睹的实录面前，你就是把刻石文中的“天下承风”，“皆遵轨度、和安敦勉、莫不顺令”、“咸化廉清”等统统化作东海的波涛，也洗不净秦始皇屠戮人民、残杀无辜的罪恶和血腥！

总之，我们认为，秦刻石作为研究秦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是值得十分珍视的。但是，由于它是秦始皇的自我颂歌，因而又不可避免地充斥大量的谎言和欺骗。研究秦刻石，必须揭露其谎言，拨开其欺骗的迷雾，从中剥取那星星点点反映历史真实的合理内核，对其进行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任何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结论，都只能造成对历史的歪曲。

注：①⑥⑦⑨⑩⑪⑫⑬《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黥布列传》

③《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④⑤⑧《史记·高祖本纪》

⑧《史记·李斯传》

⑫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转引自《马恩选集》第4卷第211页。

⑬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恩选集》第1卷第579页

⑭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恩选集》第1卷第697页

⑮⑯⑰⑱⑲《汉书·食货志》

⑰⑱《通典·食货四》

⑲⑳《淮南子·汜论训》

㉑《秦会要》第251页

㉒《汉书·晁错传》

㉓《越绝书》

㉔《淮南子·人间训》

㉕《汉书·严安传》

㉖鲁迅：《准风月谈》

㉗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4页

㉘《商君列传集解新序》

㉙《艺文类聚》五

㉚《汉书·刑法志》

㉛《盐铁论·诏圣》